

康有为诗文集

陈永正编注



# 康有为诗文选

陈永正 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康有为诗文集

陈永正 编注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125印张 4插页 464,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10111·1369 定价 2.50元

## 出版说明

《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向读者提供有关广东地方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献，以便专业和业余爱好者参考和研究之用。这套丛书内容比较广泛，不固定部数，分期陆续出版。《康有为诗文选》是其中的一部。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爱国主义者。他是当时向西方找寻真理的代表人物。虽然变法失败后，由于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取代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从先进变成落后，而且终于堕落为复辟主义者，但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是被公认的。

康有为一生中为其政治事业的需要，写作了大量的诗文，其中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这部《康有为诗文选》，选编了康有为的诗作二百二十五首、文章二十一篇，并加以较详细的笺注。

## 前 言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努力向进步的西方学习，热情宣传改革现状、抗御外敌的变法维新思想，跟封建守旧势力展开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批判反对进步、反对西学、反对改革的保守思想，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推向高潮。这时期，康有为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倾向是进步的，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但在戊戌政变后，由于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并迅猛发展，康有为便从先进变成落后，以至最后堕落成为反动的保皇主义者和复辟主义者。

康有为一生中，写作了大量的诗文，其中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我们选编了这本《康有为诗文选》，选入康有为诗作二百二十五首，文章二十一篇，并加以笺注。为了便于读者对康有为诗文概貌的了解，在这里，我们先介绍作者所处的时代与其生平及著述的情况。

### 一、康有为所处的时代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年）的一生中，经历了第二

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康有为主要的政治活动，是在戊戌变法运动期间进行的。

十九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略中国，用军舰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封建的清王朝无能保卫自己的国家，一次又一次打了败仗。由于中国长期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发展缓慢的状态，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近代面临着亡国的巨大危难。从鸦片战争（一八四〇年）到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四年）后的五十多年间，列强纷纷在中国强占我领土和进而划分势力范围，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政治，中国遭到愈来愈厉害的掠夺和奴役，清朝封建政权也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中国被瓜分的惨祸已临眉睫了。在这个空前严酷的时代，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一系列不屈不挠的斗争。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就是这一系列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对待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上，甲午中日战争前，上层社会中表现为不同观点的四个政治派别：一派是以慈禧太后为头子的地主阶级顽固派——反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代表。顽固派极力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反对一切政治改革，仇视资本主义的文明。一方面，他们害怕外国势力促使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因而盲目地排外；另一方面，又极其害怕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勾结帝国主义对之进行镇压。他们虽在垂死挣扎，却得到朝野上下一切反动的封建势力的支持，形成强大的同盟，牢牢地掌握着军政大权。一派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即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他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利用掌握了一部分的

政治、经济实权，在不动摇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创办洋务：训练军队，筹设海防，创建新式的海陆军；建立官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开设同文馆、西学馆和派遣官学生出国留学。洋务派举办新政，标榜求富求强，但也对内坚持镇压人民，对外妥协乞和。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上，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本质并无二致。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是地主阶级中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过来的人物，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新派指摘洋务派只是学了西方的皮毛，没学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求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的根本的改革，以君主立宪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另外，还有一股政治势力，就是围拢在光绪皇帝身边的所谓“帝党”的开明官僚集团，代表人物有光绪的师傅翁同龢以及沈曾植、文廷式等。他们本是官僚地主阶级的上层分子，但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他们对形势逐步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并希望通过变法从慈禧太后为头子的顽固派手中夺回最高权力，使国家变弱为强，因而支持光绪皇帝进行革新政治，成为维新派的同盟者。甲午中日战争后，这四股势力大体上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顽固派和洋务派沆瀣一气，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对外侵略者步步屈辱投降，而坚决反对国内任何改革。维新派则和帝党官僚联合在一起，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发动了戊戌变法，世称“百日维新”。

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在戊戌变法运动的同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已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创立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开展革命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在一九〇五年组成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

民生三大主义，为实现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斗争。

资产阶级维新派跟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敢、也不能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时候，仍坚持其原有的改良观点，继续主张君主立宪。因此，维新派成了立宪派，成了保皇派，愈来愈露出其保守以至反动的面目，终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

## 二、关于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它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其启蒙、创新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它在我国近代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起过积极作用。范文澜同志对此有很精辟的分析，他在《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一文中说：“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这些毒品是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经学（训诂考据）等等，所有保护封建制度的东西，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许有人摇一摇头，其为害之深之广，与象征帝国主义的鸦片（当然不只是鸦片），可称中外二竖，里应外合，要中国的命。以康有为为首的思想家们，公然对清朝用惯了的毒品大摇其头，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当时一整



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

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是通过戊戌变法这一场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而进行的。在向进步的西方和日本学习的思想指导下，维新派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阐发资产阶级思想和近代科学文化。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宣传变法“改制”的思想，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作了舆论准备。康有为的《大同书》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的美好图景，鼓舞人们去追求更美好的社会制度。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资产阶级学术名著，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在近代我国思想界上引起巨大的震动，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的洗礼。著名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写成了《仁学》，主张要“冲决网罗”，批判“君权神授”的封建传统观念。

在那一整套封建毒品中，维新派首先对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发起猛烈的攻击。康有为强调指出：“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严复把国家的衰弱危亡，归罪于八股，并指出八股的三大害：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救亡决论》）。维新派建立了新式学堂，大言时务，大谈西法，以启迪民智，打碎读书人的精神枷锁。还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办报纸，兴学会，演说请愿，以唤醒人心，鼓舞士气，使社会各阶层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戊戌变法运动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维新派向封建专制主义发动了极其猛烈的冲击，把矛头集中在君主专制制度上。康有为认识到，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制度问题，要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就必须效法先进的西方和日本。他在《日本变政考》跋语中宣称：“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采鉴日本，主要就是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把封建专制改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维新之始，先要“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上清帝第六书》）。宪法既定，就要改革旧的官制，效法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分设“议政之官”、“行政之官”、“司法之官”，使资产阶级能行使国家领导权，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事业。

维新派的理论家们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攻击，甚至比康有为还要激进。严复根据卢梭《民约论》的观点，认为君主之权非由天授，君主应是人民的“公仆隶”，君主失职，人民就有权把他撤换。他的名著《辟韩》还有力地揭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谭嗣同更痛斥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专制政治“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提出“诛独夫”、“废君统”的激烈主张。在批判封建专制的同时，维新派热情赞美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宣传民主思想，要求用资本主义的科学和民主来代替封建思想和君主专制。

维新派对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的尖锐激烈的抨击，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敢于“非圣无法”，蔑视几千年来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君权，敢于冒杀头的危险，上书皇帝痛陈国家民族的危机，这不能不说是有着很大的胆识和魄力的。

戊戌变法运动，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爱国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中国处在被列强瓜分的严重时刻，康有为

发动了“公车上书”，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富国、练兵的救国纲领，认为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挽救祖国的危亡。于是，全国掀起了救亡爱国的热潮，不少报纸刊物，纷纷揭露顽固派卖国投降的丑恶嘴脸，激发了广大群众对腐朽的清王朝的痛恨。

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封建阵营中未能分化形成强大的新兴资产阶级势力，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对比悬殊。资产阶级维新派尽管有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但幻想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帝党”的支持以实现变法，完全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维新派的政治对手却是一大批老于宦途、阴险狡猾的官僚贵族，还有一个手握军政大权的慈禧太后。结果，戊戌变法失败了。

### 三、康有为的生平

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后易号更生、更甦。一八五八年（清咸丰八年）生于南海县西樵银塘乡。这个地区位于珠江三角洲富饶的平原中，资本主义萌芽生长较快，又较早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僚地主的大家庭中，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打下了中国传统的学问基础。他又喜欢杂览群书，写那气概纵横豪宕的诗文，对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却很是厌恶。十九岁时，到九江礼山草堂从学于著名学者朱次琦，接受“济人经世”的实学，这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但国家和民族遭到的厄难，使他对传统的封建文化产生怀疑了。年轻的康有为在痛

苦地思索着、探求着。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他在家乡西樵山结识了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他俩“过从累年，谈学最多，博闻妙解，相得至深”。在张鼎华的指引下，他开始接触到近代的改良思想，了解“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眼界为之一开。同时他又往游香港，看到英国人治理的法度，很受启发，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要比封建制度优越，从此便大购西书，大讲西学，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从此，他对中国的旧文化和旧风俗也日益厌弃了。他在家乡创办了“不裹足会”，制订会章条例，发动亲友参加。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对封建势力和传统陋俗进行的冲击。

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康有为受到强烈的刺激，经过长期的探索，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把中国传统的哲学跟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形成“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的哲学体系，还把《公羊传》上的“三统”、“三世”的变易观发展成“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的历史进化观。并认为人类社会是由“据乱世”向“升平世”再向“大同世”发展的。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体系正式形成了，他不无自满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到北京应顺天乡试，以布衣身分向清光绪帝上书，请求变法以挽救国家危亡。他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变法纲领。尽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未能送达光绪帝，但书稿很快流传开来，恰如在一潭死水中扔进一块大石，在朝野引起很大的反响，在一些倾向改革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心中播下了变法的种子。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由理论研究发展成实际政治活动的第一次尝试。

以后的几年中，康有为在广东著书讲学，从事变法理论的

研究，并培养出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青年干部，这时从学的弟子如陈千秋、梁启超等都成为康有为著书的得力助手和变法运动的宣传鼓动家。

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清政府的海陆军都遭到惨败。次年，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家的严重危难，激发了中国人民心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促使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潮迅速发展成为政治行动，以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一八九五年四月，康有为在北京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发动了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请愿运动。一时间群议沸腾，强烈反对《马关条约》签订。他在亲自起草的这封万言书，即上皇帝第二书中，提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纲领。“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愿望和民主要求，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上书虽被顽固派拒绝代呈，光绪帝未能看到，但它已使变法运动深入人心，而成为一股有一定力量的政治潮流了。

“公车上书”后没几天，会试放榜，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派为工部主事，但没有到任。接着第三次上书，光绪帝终于看到了。这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觉察到维新派的变法要求，正是提高皇帝权势、巩固王朝统治的途径，因而表示赞许。康有为在六月间又再次上皇帝第四书，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要求让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分享权力。但这封书又被拒绝代呈。康有为认识到，上层统治集团中守旧势力实在太大了，必须打开缺口，在封建营垒中进行分化。他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并着手组织中国第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维新派这个组织得到陈炽、文

廷式、沈曾植等人大力支持。这时顽固派发动了对维新派的攻势，结果强学会被查封。康有为被迫出京，回到广州万木草堂中继续讲学，并写成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孔子改制考》。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帝国主义强占我国胶州湾，俄、英、法等列强也纷纷胁迫，“瓜分豆剖，渐露机牙。”十二月，康有为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帝。书中尖锐地指出，国家内外危机四伏，如果还不马上想办法挽救，则行将灭亡。必须立即明定国是，宣布变法。此书虽又被拒绝代呈，但这时给事中高燮曾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帝党领袖翁同龢也极力支持，光绪帝便命康有为“条陈所见”。一八九八年一月，康有为上了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在这封重要的意见书中，康有为强调指出：“大地诸国，皆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要求皇帝“断自圣心，先定国是”，制订宪法，改革封建官僚制度，实行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政治。这封奏书提出资产阶级维新派改革政治的全部要求，成为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同时还组织保国会，扩大维新派的政治影响，争取了不少同路人。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以变法为国家的根本方针，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六月十六日，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奉命进宫朝见，光绪帝跟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询问变法的总方针和具体事宜，他一一陈对，并着重建议皇帝破格擢用有志于变法事业的小人物，以替代腐朽的老官僚。

在“百日维新”期间，以康有为为首，梁启超、谭嗣同、林

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等都成为进行变法的重要人物。他们向光绪帝提出大量建议，并负责批阅章奏、草拟诏书的工作。光绪帝接连发出六十多道上谕，颁行各种新政。但这些诏令在基本上由后党顽固派控制的政府各部门中，都成了一纸空文，各级官僚大都采取阳奉阴违甚至公开违抗的态度。

以慈禧太后为头子的顽固派，伺机而动，于九月二十一日（夏历八月初六日）发动政变，一举扑灭了新政，结果光绪帝被幽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被杀害。历时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

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在英国公使的帮助下，经香港逃到日本，开始了十五年海外流亡生涯。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日本曾多次派人跟康有为联系，希望他能吸取惨痛教训，把立场转移到革命派方面来；但他坚持改良的主张，拒绝了革命派共同合作的要求，并把“保皇”确定为新的行动纲领。一八九九年，康有为自日本赴加拿大，组织了“保皇会”。以后三、四年间，他转徙于日本、加拿大、英国、香港间，并在新加坡、槟榔屿、印度接受英国的保护，从事哲学理论的研究，写成《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庸注》、《孟子微》、《论语注》、《大学注》等著作。一九〇二年，在印度大吉岭完成了他的名著《大同书》。

一九〇三年春，后党的主要成员荣禄死去；康有为赶忙从印度回到香港，希望光绪帝能复辟，自己便可回朝重干维新事业。这时他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此，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章炳麟写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阐明了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对康有为的思想和主张，作出了严厉而系统的批判。

在这以后，康有为日益堕落，成为反动的保皇主义者和复辟主义者，遭到国内外的革命者的唾弃。

一九〇三年以后几年间，康有为漫游欧洲和北美各国。他虽然亲眼看到法、美等国先进的政治和经济，但却没有认识到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结果，反而在他的《法兰西游记》中惊呼革命是“弥天之大祸”。他把海外的保皇会改名“国民宪政会”，打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的旗号，招兵买马，奔走鼓噪，与国内立宪派遥相呼应。康有为这时已成为革命的正面敌人了。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爆发了，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康有为在日本听到消息，惊恐万状，急忙一连发表了《共和救国论》等几篇反对革命的文章，并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妄图保存已成历史陈迹的清王朝统治。一九一三年，康有为回到阔别十五年的祖国。这时，革命果实已被大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攫取了。康有为决心为清王朝效忠到底，以遗民身分自居，拒绝到北京跟袁氏政权合作。他移居上海，当上了孔教会会长，创办《不忍》杂志，提倡“以孔教为国教”，要“冒万死以力保旧俗，存礼教而保国魂”，他的谬论受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有力批判。一九一七年，康有为窜到北京，附同张勋拥戴清废帝复辟。这次复辟迅速被粉碎。康有为一生中最后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动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

此后十年间，康有为漫游全国各地，一路上与反动军阀勾勾搭搭，讲演赋诗，念念不忘他的“君主”；还曾“觐见”废帝溥仪，参加恭祝“圣寿”活动。这时的康有为，已成为一块顽石，淹没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夏历丁卯二月二十八日），康有



为病逝于青岛，得年七十。

对康有为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我们应怎样历史地、全面地作出评价呢？《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中说得对：“历史上任何杰出人物都不可避免地由于历史或阶级的局限而有其缺点和弱点方面，对此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但是必须肯定，古往今来一切为中华民族作了这一或那一杰出贡献的人们，都应当永远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和纪念。”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杰出人物康有为，我们也应采取这样的态度。

#### 四、康有为的诗歌

康有为在写作方面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大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清朝末叶，在诗坛上出现了很有影响的“同光体”诗派。它是由宋诗派转化而来的，提出把“别才”和“学问”结合起来的主张，批判清中叶流行的神韵派、格调派专宗盛唐的空疏摹拟的弊病。但“同光体”诗派又陷入另一个极端，其诗歌的内容大都陈腐迂阔，语言拙屈聱牙，失去活活泼泼的生命力。就在这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适应政治改革的要求，在诗坛上掀起了一个“诗界革命”运动。康有为就是这个运动的一面旗帜。

“诗界革命”运动的中坚人物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等人提出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创作主张，他们反对崇古卑今而盲目摹拟古人，提倡以新名词和通俗语言入诗，以便反映新时代的现实和表现诗人的新风貌。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写的《日本杂事诗序》和《人境庐诗草序》等文章，就是指导“诗界革命”